

主 題：「疫病·政治」國際工作坊

第一場——防疫、免疫與民主政治

時 間：2020 年 6 月 6 日（六）早上 10:00 - 12:00

地 點：成功大學 C-Hub 成大創意基地三樓會議室（光復校區）

講 者：Alain Brossat 教授（玉山學者、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約聘  
研究員、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

翻 譯：羅惠珍（評論家、翻譯家）

引 言 人：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主 持 人：翁文嫻（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謝仕淵：先跟大家說明一下，人社中心為什麼辦這次活動，告訴大家我們一直以來是用什麼觀點跟角度，在台南來面對社會科學研究乃至於時間的事情。我們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實踐跟研究態度是有一致性的，去年希望經由幾個議題的經營，並希望它具體地延展出社會行動來。我們關注了兩年，關於遷徙和移民的議題，也以「沒有歷史的人」為名處理各種不同沒有被扯進歷史的社群，來看為什麼沒有被討論，在社會造成了什麼問題。這些事情我們不僅透過像類似今天的機制，像是工作坊、研討會，也試圖把這個議題跟一些我們去年的行動接觸，跟四個高中合作、討論。去年高中所做的是談論外省人的白恐，在台灣也是很少討論的議題，最後完成一個展覽在各校巡迴。

也就是說，人社的行動本身除了議題討論跟對話之外，我們更重視的是延伸對社會的協助跟合作，包括一直以來我們持續舉行的人文沙龍，邀來不同領域的朋友。他們許多都是不同議題當中，在那個位置堅守很久的實作工作者。這些實作工作者在經驗當中，跟我們對於學理的討論，對文化是有些刺激跟幫助的，這大概是人社對於新的社會議題的態度，不只是一要討論，還希望能夠擴延出不同行動，希望藉此去架構成大人社中心在面對人文社會科學的態度，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今天會辦這場「疫病政治」的國際工作坊。在我生命當中，未曾經歷用這麼長的時間這樣生活著，就像 Brossat 教授提供給我們的這篇文章當中，在此同時我們不僅僅關注疫情的擴散跟控制，延伸到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這已經是後疫情時代更直接的衝擊。我們如何在這種污名的想象中，如何從台灣的位置來看待這件事？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最主要原因。

翁文嫻：非常歡迎我們今天的貴賓、Brossat 教授。我們還有兩位，右手邊是林深靖先生，左手邊是羅惠珍女士。我身為主持，是門外漢，是中文系教現代詩的老師，留學法國的背景，我去年也有主持過一個很大型朱利安先生的會議。不過 Alain Brossat 讓我印象很深。林深靖先生常常在台灣辦很多這種延攬外

國，特別是法國社會學系跟政治領域有關的學者來我們台灣做些深度左派探討。左派是沒有能力、貧窮的、地下的那些無產階級，不是我們現在的左派，我覺得這種推動還蠻有意義的。

**Brossat** 來過我們台灣很多次了，他的領域是關於暴力與政治的研究。這個示威在最近幾年不同國家、種族有不同示威的反抗政治組織的現象，**Brossat** 這位教授很長期研究社會裡面為什麼有暴力、示威的形成，他有一種用自己的角度來探索。他是巴黎第八大學的哲學系教授，以哲學領域來探索這些暴力示威、衝突形成。我印象很深，就是在法國興起的黃衫軍的運動，看好幾篇 **Brossat** 剖析的文章，蠻精彩的。他有來過兩次演講，對去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有一些剖析，各位可以去找他相關的論述。

今天議題是疫情與政治，本來疫情是一種難預測、很大的、不容易處理的問題。但我們在人的問題上也產生不同國家、種族、利害關係以及不同傳統文化的關係，因疫情產生的問題，不只是不可觸摸的部分，還可能觸及每個種族不同的立場。這個議題請 **Brossat** 相當適合，他也是我們去年開始的台灣玉山學者，在交通大學的跨領域的社會科系，他的教學重點是，以系統式地往返評論，就哲學文本評論來啟發學生練習哲學式的寫作，不只是教哲學家的閱讀，而是那些文本的爬梳裡面。我個人也有教法國當代的文批理論，如果我要教現代詩，就一定要教這個。個人很喜歡法國意識批評的文批理論，所以學生閱讀真的碰到困難，困難不是內容，而是作者怎麼寫成怎樣？為什麼碰觸到這個領域？而在 **Brossat** 老師課堂上學習到文本的爬梳裡面，上下文、上下段思維方法的不同。對以一個華文為主的學生，如何吸納一些西方柏拉圖以來的哲學思維跟論編的方式，這算是尖銳的碰撞問題，**Brossat** 真的很懂華文學生思維狀況。他今天帶來這個火辣辣的疫情跟政治問題，應該是很多人心中都很疑惑、焦慮，但我們確實沒有足夠知識去處理這件事。

旁邊兩位譯者，林深靖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很積極努力介紹給我們台灣社會有關於不斷發展的左派，他以前是《立報》的主編，現在是《風傳媒》裡面的「林深靖觀點」，還不斷地從事社會評論的思考。另外一位翻譯羅惠珍女士，也是巴黎第八大學的哲學博士，畢業回來以後，他從事跨領域的一些工作，也是翻譯的專家，他非常能體會 **Brossat** 領域的各個種族、議題等。

**Brossat**（羅惠珍翻譯）：從 2020 年初到現在，這個被命名為 COVID-19 的病毒瘟疫蔓延撼動了全世界，到現在還沒完沒了，希望能就這個疫情發展的觀察，提供給在座各位我的反思。

新冠疫情到現在已經將近五個月了，延燒全球產生許多效應，因此我特別要以歐洲或更大範圍的西方世界和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做個比較，同時我會針對我熟悉的法國和台灣，在這波疫情的各種效應提出我的觀察跟分析。從流行疫情到大爆發、廣泛的蔓延，世界各國都發生一個共同現象，就是無論在各個領域生活作息、所有的正常運作都不得不中斷或暫緩，同時為了抗疫跟防疫，每個國家都採取了程度不一、形式多元的國家安全緊急狀態。

**羅惠珍**：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因為從 2/19 之後，Brossat 老師就到台灣，所以他對台灣這段期間的防疫做了密切的觀察，他在其中體會到整個防疫的過程跟所造成的影響。

**Brossat (羅惠珍翻譯)**：即便在像台灣這樣的國家，政府當局為了因應疫情蔓延的風險而做了充足的準備，因此不論在經濟或者社會生活，在防疫的前提下，我們許多正常的運作都已經受到大幅的改變，我們看到，病毒在台灣造成的損害是非常有限的。在前一段時間相應的措施，我們也看到，台灣也展現出不同程度的限縮。這幾個月來，台灣社會生活在防疫時刻，每個人就必須承受抗疫措施的種種限制，而這些約束改變了政府的管理方式，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有人們的日常生活。

新冠疫情建構了一個重大的實踐，因為我們已經不在一個平常時期，即便在像台灣這樣的國家，許多事情都在政策跟公共衛生當局的管制下，不論個體或群體都受到限制，如此重大的事件會引導我們思考以下的問題：譬如說我們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到底怎麼了？我們要如何才能因應這個事件？到底該怎麼做，才能夠讓這一波新冠疫情參照我們所知道的流行病所帶來的傷亡跟損害？或者我們把時間更推進一點，他會不會像車諾比核災、福島核災，甚至像 2004 年南亞大海嘯所帶來的大災難？

這種全球性的疫情所帶來的健康災難是我們大家每天從媒體有目共睹的，在世界各國當中蔓延，不斷地有人死傷，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停留在這個數字或蔓延資訊問題上。但我們要仔細觀察這幾個月以來，全球經濟嚴重衰退的重大危機，或新冠疫情帶來的國際政治緊張情勢，更加劇美國和中國的新冷戰衝突。如此一來，我們就能明白，新冠疫情產生的危機跟衝突，比疫情的資訊更需要被密切關注。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全球大爆發的公共衛生危機，並不能模糊或遮掩掉某個國家或地區所呈現出來的相當明顯、對比的疫情效應。以法國跟台灣作為比較，法國人口大概 6700 萬，扣除海外、過去的殖民地，法國本土是 6500 萬人，人口將近台灣的三倍，但我們能看到明顯的對比，臺灣死亡人數不到十個人，而法國將近三萬人死亡。就在這波新冠病毒的侵襲之下，這個對比是相當明顯。另一個全球疫情效應有很明顯的對比，無論是在台灣、南韓，甚

至中國，我們在這次疫情所看到的是，對抗病毒是由政府和人民共同面對的挑戰，新冠疫情被當作是一個集體的實驗。但反觀法國跟西方國家，義大利跟西班牙，甚至英國或者是美國或巴西、拉丁美洲國家，新冠疫情會被視為是凸顯這些國家的醫療體系的崩潰瓦解造成大災難。

因此我們需要去探究這個對比的理由，很顯然這與政府有直接的關連，同時也關聯到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關係。如果我們只採用現在市面上流行的政治科學、政治哲學的理論分析，我們恐怕就無法深入分析那個對比的理由，所以現在做的分析，需要一些想像。西歐國家和台灣跟南韓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所謂經濟自由民主國家，我們也可以用比較不正面的用詞，就是所謂的市場民主國家。既然東亞跟西歐同樣是市場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面對疫情考驗的時候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呢？針對這個問題，有幾個說明。

在法國、英國也許還有西班牙跟義大利，但很明顯不包括德國，這些國家的公衛系統，特別是醫療體系方面，幾十年來，都成了某些人稱之為「破壞」結構的對象。為什麼在這一波疫情裡，這些國家災情比較嚴重？這個結構性的破壞是由歷屆政府和部分經濟部所主導的。至少自從本世紀開始，極端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跟思維，已經盤據了剛才說的那些英國或西歐國家政府的大腦，由極端自由主義所引導出來的觀點會認為所謂的「健康」，必須是由市場、金融、股市的價值來決定，這必須要依照預算跟成本考量，而根本不是服膺於廣大民眾的需求。這個所謂破壞性的結構，是西歐國家採用，非常極端自由主義的價值跟取向，這個轉折事實上不著痕跡在悄悄進行著，他對於傅柯所謂生命政治的質性影響非常大。歐洲的公衛體系受制於市場經濟這數十年來的所帶來的結果我們都看到了，西歐國家在面對這一波疫情的時候，無論是現有的醫療體系或是醫護人員怎樣地疲於奔命又完全招架不住，導致死傷的規模超過想像，這是非常嚴重。

我們回顧西歐國家，法國跟英國的公共衛生歷史，有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步建立的，體現了社會國一項非常珍貴的政策。而這項寶貴的資產，對於目前具有意味的極端主義核心價值來說，一點都不符合經濟效益，所以應該要修剪枝幹、節省開支，縮減人力跟物力的成本，因此社會國家行之多年的公衛體系就這麼一步步地被摧毀。歐洲大部分是公立醫院，根據極端自由主義的思考，必須要企業化的經營，不能造成赤字，不可以再把政府預算信用卡刷爆。因此，政府在編列公共衛生預算的時候就要東刪西減，刪減的幅度一年比一年廣泛，金額刪得一年比一年多。我們從西歐國家，特別是法國的醫院的人事編制不斷瘦身，跟器材預算逐年被刪減就能夠理解。我們用過去跟現在的醫療體系做對照，好比說在 SARS 的時候或 09 年的 H1N1 時，會有因應、未雨綢繆的防範措施會出現，但現在這些都因為在經濟效率的考量之下，這些未雨綢

繆的思考會被拋棄。現在其實我們又看到，對重大疫情的事前防範甚至備而不用，他其實是很務實的。

現在說的就是這幾個月發生在法國，我們會覺得很激烈的事情，跟著這波疫情所凸顯的一個重要問題。這種儲存公共衛生戰備物資的務實作法，在法國確實反其道而行，隨疫情發展，我們終於看到原來法國政府這幾年來將儲存的口罩銷毀，在 2009 年 H1N1 他們儲存了十億的口罩當成戰備物資，當時還未兩綢繆，沒發生最好，但至少要預先防範。可是在 2011 年開始，這些在公共衛生未雨綢繆的思考慢慢消失。口罩本來有十億個，到今年二三月只剩下幾百萬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形？因為有一些過期就銷毀，也不補新的，因為法國認為公共衛生預算支出裡面越來越少，因此能省則省，而且也越來越佔地方。所以當義大利爆發疫情，法國開始有疫情，政府在盤點庫存的時候，才發現預用的口罩數遠遠不足，已經出現口罩荒了。但疫情來到眼前，怎麼辦呢？這時候法國政府官員、媒體和一些科學界、醫學界的專家們，就組成了一個共謀結構，不斷發表一些虛假的論述，說戴口罩根本不能阻絕病毒，沒戴好反而更糟糕。要不然他們就說戴口罩是亞洲人習慣，東西文化差異大，戴口罩跟西方生活方式是不相容的，總之，不需要戴口罩。法國在疫情爆發的時候，從政府的發言人、專家小組召集人到媒體，鋪天蓋地一片口罩無用論。

回過頭來談談傅柯所謂生命政治的哲學。傅柯認為現在政治體制的基礎在於生命政治，這跟君主時代、王權時代的政治體制的方針是截然不同的，傅柯說傳統的君主政體是一種最高主權的政治體制，像國王君主這些治理者，手上握有對臣民百姓的生殺大權。既然在傳統君主政體最高主權施展權力的時候，所展現出來的就是：順我生，逆我亡。傅柯在《規訓與懲罰》這本書就淋漓盡致地展演了路易十五時代的巴黎格列夫廣場的一場車裂、五馬分屍的刑罰儀式。被處以五馬分屍的達米安是在凡爾賽宮，趁著路易十五要出門的時候去行刺，但只把他刮傷而已。雖然路易十五只受了輕傷，但是達米安就被判了弑君罪，而被車裂刑罰處理掉，這是君主時代。我們從剛剛君王體制要轉向到現在的政治體制，就是傅柯所謂的生命政治，傅柯說治理者的任務就是要讓他的人民能夠好好活著，政府是人民的守護者。以猶太人傳統中照顧羊群的牧羊人來比喻現在體制的治理者，你是牧羊人，就要把你的羊群顧好；你是一個政府，就要把你的人民顧好，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建立的社會國就進入生命政治的這條地平線。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樣呢？當前一些國家領導人受到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啟發，將市場健康的考量作為優先選擇，而限縮了對人民健康的保障，要讓市場存活下來，而不是優先考慮讓人民存活。如果我們參考前面傅柯說的政治體制轉折的話，在同樣扭力之下，現在政治體制中作為里程碑，生命政治的思維已

經被扭轉到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了。如果我們不從普遍脈絡觀察的話，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歐洲拉丁語系國家和英國政府面對這波的新冠疫情，整個治理系統會那麼輕易就土崩瓦解，在病毒這個看不見的敵人面前徹底崩潰。當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在歐洲出現病例，甚至在義大利北部開始蔓延的時候，我們剛剛講的這些西歐國家的政府並沒有意識到事態嚴重，並沒有意識到要採取緊急措施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跟健康。恰恰相反的是，這些國家政府為了不造成經濟斷裂影響到工業生產或商品的流通或觀光產業的運行、體育文化活動和市政選舉這些等等，這些國家的政府都盡量避免去敲新冠疫情的警鐘。

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他們一貫的做法是要先低估疫情的嚴重性，讓日子一如往常，儘管種種事態嚴重的跡象已經在聚攏堆積了。法國政府維持第一輪 3/15 的市政選舉，全國各地的競選拜票活動、造勢活動照常舉行，3/8 國際婦女節的大遊行也熱烈登場，各種球場賽事都沒有停止，但這些時刻正好是新冠疫情發威、在法國各地散佈的時刻。像我剛剛講的，法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的這些作為不僅缺乏遠見，而且對我來講，應該可以被視為一種罪行的盤算。

問題的根本在哪裡？在於他們用文化偏見製造種族歧視，這些國家領導人、菁英跟許多民眾根本不相信會面臨到新冠病情的瘟疫蔓延，歐洲人、西方人、大部分的白人都不相信會遭到病毒的肆虐。他們不相信病毒會來到家門口或受到病毒肆虐，就像是康拉德著、孫述宇教授翻譯，20 世紀初期的一本小說《颱風》，西方白人在面對這波疫情的心態就像這本小說的情節。在 20 世紀的初期，有一艘掛著暹羅旗幟的南山號的汽船，載滿了貨物跟兩百多名的中國的苦力，從南洋要返回湖州，這些苦力們都被堆在夾板間的小倉間裡面。這艘船從南洋要航行回湖州，在經過台灣海峽的時候遇到颱風。船長看到海圖室的氣壓表，氣壓一直在降下來，他只說沒有起風，感覺是風平浪靜，只是氣壓一直降，他認為肯定在某個地方出現了不尋常的爛天氣，中文的翻譯是：醜天氣。那個船長看氣壓一直降下，但是沒有起風，他說不知道哪個地方出現鬼天氣。船長一點都沒想到他所謂的某個地方就是在他的船上，破壞力強的熱帶氣旋颱風已經來到他眼前了，他卻沒想到。這艘船裡面有他的船員，跟兩百多名中國苦力，其實是從中國到南洋去工作，七八年以後存了錢，就跟著這艘商船要回去中國。在這艘船上的人們，好像政府載著他的子民一樣，這艘船正面臨一場瞬間就要降臨的大災難，就像我講的西方世界的白人一樣。這本小說裡面的船長，被康拉德批評缺乏想像力，沒有能力去思考颱風帶來的威脅，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對災難的來臨。所以缺乏想像力是根本問題，就像我前面所說的西方世界的白人，就跟康拉德小說講的一樣，災難來到眼前了，但是他們完全不知道、沒有能力去思考。

西方世界的領導人為什麼會像康拉德小說裡面的船長一樣缺乏想像力呢？面對新冠疫情，這些西歐國家的領導人都處在南山號船長同樣的立場，但如果都像夢遊者那樣，腦袋迷迷糊糊的，眼看疫情爆發如滔天大浪撲向他們治理的人民，那必然是當時他們相信，這種災難只會波及到他者、這個疾病只是他者的。我們可以從非洲剛果伊波拉到中國武漢，從伊波拉病毒到新冠病毒，西方國家政治菁英裡面很精實地建立了他們的免疫自戀，他們根本沒能力想像在目前全球化經濟的運行、密集的全球移動中，病毒可以從天涯快速流轉到海角，從世界的此端到彼端，跟著觀光客跟商旅客人搭著飛機到處去，暢通無阻。商旅的人群這邊主要是指中國的移民，往返在溫州到閩南或者是杜林，在很短的時間裡面，你才剛要把它稱為中國病毒，它一下子就變成義大利病毒或者歐洲病毒。

文化偏見導致了歐洲政府在跟病毒作戰的時候完全是被攻城掠地、束手無策，我們可以從 2009 年的另一個疫情得到解讀。為什麼現在歐洲是這個樣子？由於當初 H1N1 病毒在歐洲、西歐國家爆發的程度並沒有像亞洲這麼嚴重，沒有造成大流行，因此這些歐洲國家政府跟人民他們都相信類似的流行病不會在歐洲爆發，所以新冠疫情出現的時候，不用浪費人力、物力去研究，也不用儲備口罩，不用事先準備、配備一些呼吸器，更不用研發任何事，因為他不會來。就像我剛剛講的，這是一種帶著種族歧視色彩的自大跟傲慢，如果我們能從這波疫情得到一些益處的話，就是它徹底顛覆了「他者」的疾病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這個世界從來就不存在著他者的疾病。儘管川普和他那一幫子的人費盡心思想要把疫情帶來的損害推給中國、污名化中國，這個做法就像納粹要強迫猶太人戴上黃色星形標誌一樣。

我不會嘗試去提出一個最終的解釋或結論，因為即使像是在東亞地區，台灣、南韓或者是中國的疫情發展跟整個防疫措施等等都有很大的差異，以下我只針對一些觀察提出我的看法，這個大家都可以檢驗的。首先，在東亞地區，無論治理者或被治理者都會對社會的脆弱有極大敏銳度，因為我們知道可能的重大風險都足以重創這個社會，這個就是社會的脆弱性，而且我們過去的種種經驗也滋養了這種敏銳度。這和西歐以及北美洲那種缺乏警覺、半夢半醒、迷迷糊糊的免疫思維，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並不是說這種對社會脆弱性具有敏銳度的思考，在面對重大危機的時候就能百戰百勝，例如日本政府對於福島核災的缺乏準備，2003 年 SARS 風暴的時候，中國和台灣權力當局都是一個例證。不過大致說來，在歷經災難幾十年來，治理者或是被治理者對風險危機的敏感度就會逐步提升，因此，在這波疫情中足以見得，當 COVID-19 病毒出現時，某些國家領導當局的反應和民眾的預防措施，都顯示出我們在面對疫情的時候，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那麼反觀西歐國家在這波疫情爆發的初期，在面對危機的時候，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是無憂無慮，我們稱之為病毒懷疑論，我在此借用氣候懷疑論的詞彙，指認一些否認溫室效應的論述。當時就算義大利已經開始封城了，法國的確診病例也確實增加的時候，還是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喝酒，根本就否認病毒的存在。在法國總統宣布封城前的那個週末，在春天陽光的召喚下，法國從南到北，公園綠地、河堤岸上，滿滿是無憂無慮的民眾，他們的心態是：我才不怕。

當然我們不能忽略中國的官僚體系延緩通報武漢已經爆發的新冠疫情病毒，而導致病毒的迅速蔓延，這是北京當局最受到國際指責的地方。但我要說的是，在疫情控制相對成功的國家，南韓或台灣，甚至是中國的防疫，這些東亞地區儘管政治體制不同，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關係各異，但卻有個共同點是，疫情控制住了，染疫跟傷亡的人數都比歐洲國家相對少。武漢疫情在爆發的時候，中國地方官僚體系因為通報過晚，導致於抗疫太遲。在面對如此重大的危機，北京當局他所採取的，是一個戰爭的部署，對重災區是以強硬的封城禁足的措施，使疫情得以控制。在中國，這些措施也未曾施行過，直到發生重大健康危機時，才會斷然施行。這些封城禁足的措施，使得重災區的災情不至於變成瘋狂的海嘯，也不會導致多數居民滅頂，同時可以在數個星期內將疫情穩定下來，避免造成染疫的死亡人數大幅劇增。雖然台灣跟南韓並沒有採取像中國這麼嚴厲的防疫措施，但這兩個國家所採取限縮公共自由的例外部署都已經適當。換句話說，對確診或疑似個案都採取隔離措施、追蹤檢疫，台灣跟南韓都採取這樣的部署。因此在防疫跟抗疫的領域，國家之間真正的分界線並不是民主抗議模式和極權抗疫模式的差異，這條分界線應該是地緣政治和生命政治範疇的分界，這是一條疫情掌控跟疫情失控的分界線，是漫不經心的政府和無憂無慮的人民，對照著政府和人民團結一致、齊心齊力，不讓兇猛的疫情浪潮蓋過頭頂的這個分界。我們從全球染疫的傷亡人數，就可以清楚劃分出這條分界線。日後我們會記得這個新冠疫情在東亞地區所治癒的人數，而在西歐、美國或巴西有多少人是被遺棄，他們健康受損，甚至喪失了性命。

從當代的政治跟治理性的角度切入，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所帶來的初步教訓是很清楚的，在民主體制的社會因為疫情爆發，出現人命關天的重大風險的時候，採用了一些措施和策略。而這些運作擱置了法治國的原則，並且大幅限縮公共自由，在民主體制規範中，引進大量的例外因素。這些運作在西歐國家雖然是以公共衛生危機的名義進行國家緊急狀態，但問題他們並不是通盤運作、整體承擔，而是經常朝令夕改、反反覆覆，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我認為這恐怕是今天某些民主國家的特質，作為一個公共民主，就是沒有能力承擔跳進這個位置的威脅，而是把他們轉移到一個例外狀態。在一個現在我們把民主化看起來好像唯一符合文明生活的時代，這些民主國家就必須要傾全力去保持民主形式的



外貌，那麼在面臨像目前這麼大的危機時，只要總統發表演說，指示民眾無限期地在家就夠了，這個是法國的例子。

面對疫情蔓延的重大威脅和致命威脅的時候，我們現在看到的民主體制，他說是沒有能力跳過自己的影子，因此出現了有限性，也就是背著自由、自由人權跨越不過去。以法國為例，就算 3/17 開始實施隔離，大幅限縮了人民的自由，但他也要費勁唇舌去解釋。法國的相應措施是顧及到人民的自由，「我們法國並沒有完全像中國那樣嚴厲封城，是不一樣的，還是可以出去運動。」但事實上法國封城措施跟中國並沒有明顯的差別，但他又要這樣去講「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跟所謂極權國家在面對疫情所要採取的隔離、封城、禁足的措施是不同的。」不過即使用詞不同，所施行的是沒有差別的，例如法國出門還要「路條」（按：中國地區一種通行證），去買個菜、買個藥，出門也要帶路條、拿身分證，證明你是不是真的離你家最近，不是外地來的，而且一天只能出門一個小時。這樣的規定，不會比中國自由到哪裡去，甚至還更嚴格。但這時候，我們已經產生了民主形式和威權對立的界線已經模糊掉了。

這段要說的是對台灣的觀察，對照法國大概過一個月各方辯論之後，現在才要開始使用手機定位監測有疑似病例或接觸確診者的人，但因為民主國家要注重個人自由跟隱私，一個月以來，很多人激烈反對。至於在台灣，則以智慧型手機定位可以抓到四處走跳的居家檢疫者跟隔離者，從中國回來的疑似案例也可以在夜店、卡拉 OK 抓出來。雖然這個手機的監測追蹤，很明顯牴觸了人權的基本標示，但他確實發揮了很大的防疫效用。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量體溫、要戴口罩的這些檢查點，是基於防疫的嚴格要求，這不能依循著公共自由的嚴格定義來詮釋。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檢查點，或者可能像中國有一些也要用微信去看你能不能進入，其實我們也看到防疫是要拿嚴格定義的自由去換取的。因此在這時候，在疫情的過程，我們看到人權的正統教育跟生命政治合理性的衝突從來沒有這麼明顯過。

剛才提到，防疫是要拿嚴格定義的自由去換取的。如果在疫情爆發之初，歐洲的治理者就能嚴肅看待，以救治人命跟照護民眾為首要的使命，你們就應該要大幅限制那些習以為常而且被認為普世價值的自由，例如：行動遷徙、尊重隱私、言論表達的自由。舉台灣為例，一些危害到抗疫、防疫的假新聞，在台灣是會受到司法制裁的，你不能以言論自由來從事一些違反抗疫的措施。但是某些權利的問題，也同時在這一波疫情裡面遭受重大改變。特別是在禁足時間，一些有關自由的基本概念就顯得模糊不清，因為我們不能像往常一樣的自由自在。但比較重要的是關於生命權這方面，就是每個人民都應該受到健康照護的權利，在疫情失控的時候也失去原本有的保障，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醫療資源的。在歐洲國家或是美國也是一樣的，安養院的老人更是處於一種自生自

滅的情境。這個就像在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美國和巴西等等，這些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尊重最弱勢族群，最具有被感染風險族群也沒有享有該有的生命權。安養院的老人、街友、移民以及住在貧民窟住在擁擠地方的人，他們的生命權都不存在了。

法國向來以人權祖國自居，喜歡在民主跟人權的議題上像個小學老師一樣到處說教，可是在面對疫情威脅的時候，人身運氣好不好所造成的不平等，在法國就成為令人憤怒的天大醜聞。在這個意義上，新冠疫情造成了全國規模的大災難，對於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來說，他也成為檢視真理的一盞明燈。前幾天，法國的權威媒體《世界報》，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寫這樣：「美國軟實力的末日」，新冠疫情的蔓延被視為是一個浮現真相的時刻，加速美國霸權的崩潰。

面對疫情，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之一，當然是去探究，無論是對治理者或是人民、尋常百姓來說，我們應該會有一個共同的經驗，這個集體經驗會是什麼？會有多深刻？那麼放眼全球，在每個地區的人民，都會體會到他們的政府、領導階層以及相關責任部門的菁英們，在面對此類的重大危機跟災難的時候，根本就招架不住。他們會到處取經、四處學，而在這個時候就會看到台灣其實是到處被報導、學習的典範。大部分疫情蔓延嚴重的國家，人民在經歷這幾個月災變的時候，會體會到他們集體的脆弱無助，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在新冠疫情中看到一種優生學的隱藏版，但大量的病患湧入，醫院的床位、呼吸器或檢測的試劑，甚至連醫用的口罩都不夠的時候，當我們沒有能力醫治所有人的時候，有些人會比其他人更應該被救助，這就是所謂「優生學」的隱藏版。人們也看到了那些被治理者，被政治菁英們歸列為脆弱、被當過沒有用處的人，在這種危機的時候，就會被當作是一種消耗財。所謂的可消耗，是指他們可以被犧牲掉的，這裡的「犧牲」並沒有宗教意義，這種體悟在一般人的集體記憶裡面會留下深刻的著痕，會繼續滋養著人們對政府和精英階層的不信任。雖然已經很不信任了，因此一般民眾也會明白，當我們遇到疫情這種處境的時候，最好能自力救濟，也依照自己的能力跟條件，民間自行組織互助的網絡來共度難關。至於治理者跟菁英階層，很不幸地，新冠疫情的教訓幾乎不可能要他們脫離經濟發展跟擴張模式，他們對經濟至上的這種黏著，就像淡菜吸附岩石，牢牢地吸著不放。

我們以法國為例，在整個疫情發展的時候，法國的知識界提出了很多反思，學者就提出很多具有洞察力跟遠見的諫言，也指出疫情危機跟全球溫室效應和地球過度開採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因此這個公衛的危機也是地球、人類的轉機，會迫使我們重新去思考各種開發、發展及擴張的模式，同時也會讓我們轉個彎，朝向另一種經濟模式，並重新配置人類和他所賴以生存的環境之間的關

係。可是，我們看到了就算疫情的危機都還沒有結束，大量的產業經濟振興計畫都已經開始進行，特別是汽車製造、航太工業、畜牧養殖業，紓困的鑰匙再度打開了能量的消耗跟城市污染的大門。總之新冠病毒到處流傳都已經很清楚顯示了，經濟發展模式帶給人類生活型態跟疫情蔓延的關係根本就是連在一起的，在這種高舉發展擴展旗幟的模式下，這些國家的治理者，就像正在指揮著一列行駛在軌道上的高速火車，雖然他們都明白目前的處境如臨深淵。但這些治理者根本沒有能力掌握這些高速火車的行駛，他們既沒有辦法讓列車轉向，也沒辦法要列車停止。從這個意義觀之，新冠病毒所帶來的災難對他們來講沒什麼經驗教訓，對西歐國家政府來說，也許他們下次就會多儲存幾百萬個口罩，也許還會有些疫苗可用，這些疫苗的效用還需要檢測。但對於美國的來說，情形可能就更悲慘，美國的弱勢跟貧窮的族群永遠是得不到社會保險的資助的。

在結束我剛剛這樣一連串悲觀的論調之前，我還是要強調一下，在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我們恐怕沒有什麼機會從我們所經歷的 COVID-19 疫情裡面得到寶貴的教訓。為什麼我會這麼悲觀呢？因為全球蔓延的疫情並沒有讓國與國之間、國家陣營之間或者高科技集團、跨國金融集團或者工業集團之間，放下彼此的競爭跟對立，團結合作共回來退抗新冠病毒的侵略。恰恰相反，新冠疫情還跨越到美國和中國新冷戰的戰場，更確切地說，新冠疫情增強了美中外交關係緊張，美中貿易戰的衝突也越演越熾，新冠疫情他加速了各區域或各區塊陣營的戰爭。

隨著新冠病毒全球蔓延跟慘重的死傷，疫情導向政治化如雪球般越滾越大。以美國白宮政府共和黨為例，他們以中國病毒、武漢病毒所發動的仇外和種族歧視，其實是最糟糕的政治化導向，以疫情達到政治目的。白宮當局不斷控訴，要求中國讓疫情透明化，這所有的目的只是為了讓川普順利在 2020 年的 11 月連任。台灣的執政當局其實也屈從於川普政府陣營，被編隊到川普的旗幟以下，我認為在這前提下，台灣執政當局將前途寄託在川普政府，絕對不是利多於弊。一些很客觀的觀察家都認為台灣在這麼長期間種種防疫行動上的努力跟成就，都會因為上述的這些政治操作而變味，就如同法國的一句諺語：「一滴膽汁，就壞了一桶蜂蜜」。其實我們也看到利用新冠疫情的蔓延試圖在冷戰的棋盤上推展棋子、計畫衝突，很多政治智慧不成熟和不負責的政客們都嘗試這樣做。

全世界各地人民無一倖免於新冠疫情的災難。在歐洲，許多人失去了他們的朋友、親人或相識的人，人民的生活，不斷地受到衝擊，心裡竄動的後遺症恐怕也會相當嚴重。弱勢族群的經濟急劇惡化，把窮人都拋進了悲慘世界。本來我們還可以期待政府至少可以承認犯的錯誤跟草率行事，然而他們卻把防疫不力

的責任與模糊的控訴中國政府隱匿的疫情，用來轉移他們自己失敗和背叛人民信任的焦點。今天的全球政治局勢變化這麼急劇，其實就像一部失速列車，我們無法預測未來會怎樣，就像法國的一句諺語：「我們不知道會被帶往哪裡去，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就是我們會直直往前衝。」

**翁文嫻**：非常感謝 Brossat 教授來幫我們分析疫情與政治層面的一種狀態，其實他講到這種西方的民主政治還有白種人的社會，將疫情作為他者來處理。他引用康拉德的小說真的很有趣，白種人可能不會被疫情感染這種他者的想法，可能也跟他語言有關，分析得很有趣。以下開放問答。

**觀眾 A**：第一個問題，在討論台灣跟其他國家對疫情的應對措施的分析部分，有些學者提到說主要是因為 SARS 過後，我們有訂立傳染病防治法去應對這樣的緊急疫情的情況，因為有這個法律，我們的應對程序比較完善。但看西方國家，可能因為沒有這樣的法律制度，他們剛開始面對時，要有相關法律體系去處理，英國就有緊急去立一些法律規定。我想請教 Brossat 老師對西方國家法律體系的完善性，跟因為疫情我們對於自由、人權的侵害，有什麼看法？因為疫情，透過一個法律體系去限制人的權益，這樣的一個形式，在歐洲民主體制下，是一個可行的方式嗎？

第二個問題，這次疫情在歐洲蔓延的途徑過程中，可以發現，過去歐洲整合的一個政治體，這過程中好像也出問題。有一個例子是瑞士買了一些口罩，德國政府好像在邊境攔截這個口罩，不准賣到瑞士去。就是有些跨國之間、邊境的管制或國家間合作，在疫情中受到一些影響，想請老師談一下，在疫情之後，歐洲整體整合是不是也可能因為疫情而受到影響？

**Brossat (林深靖翻譯)**：雖然有過去所謂歐盟的經驗，但在這次的疫情、危機當中，看不到你剛所說的團結，我們看到的反而是歐洲集體陷入恐慌當中。這個恐慌造成幾乎歐盟裡面的每個國家都只想到他們自己，包括去攔截從中國來的口罩，甚至把飛機攔截、搶奪口罩。歐洲想到的還是只有市場，他們是想到疫情過去之後一切又會復甦，整個經濟會再重啟、重新出發。

剛剛也問到關於法律體制的問題。整個歐洲，例如法國，本來的體制系統就有一些法律，但事實上在面對冠狀病毒的時候，有很多是在層次很低的，比如說總統口頭的講話，或者說一些文件、文稿，但不是在真正的法律系統。不過，整個法律的佈置並不是那麼關鍵，關鍵的還是一個政府是否有很好的管制能力。比如說相對於台灣，台灣在整個疫情的發生過程當中，中央很快就有個集權統一的管制方法，每天對於新的疫情會有管控，也有人告訴你今天發展到什

麼程度。從第一個病例發生的時候就開始去追蹤相關的人員去做檢測，這是一個好的管制手段，也許不是明確的法律，但就是要有方法。

**羅惠珍：**法律不是問題，法源都有，並不是沒有依據。最重要的是，領導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流行病」、「疫情」，他們覺得生病就醫治，不知道流行病是會鋪天蓋地，就像颱風一樣。舉康拉德的小說就是這樣，那東西是瞬間就來、淹沒你。所以我們要怎樣去預防是比較重要的，而不是生病就醫治。

**Brossat** 認為這是第一政府沒有能力思考問題，也就是想像力不夠。再來，從台灣例子可以看到，當有一個案例的時候，我們立刻去追查，就是要避免群聚感染。但是法國政府卻任群聚感染出來，讓他持續發展，從他們解封到現在，已經有 109 個群聚感染事件，法國政府到目前為止沒有從疫情得到什麼教訓。

**林深靖：****Brossat** 還提到，在歐洲法國或英國，都有一定程度迷信所謂集體免疫的這個方法。他認為面對這麼重大的疫情，事先準備工作是很重要的，不是等待它來之後、已經爆發嚴重之後你才去對待。就是預先處置、預見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觀眾 B：**我一直都認為 COVID-19 是生物戰爭，因此勢必牽扯到政治，包括分配。所以我想請問一下：第一個，在這個生物戰爭過程中，我們看到歐洲國家的政治分配或勢力版圖中有什麼變動？第二個，因為歐洲國家大部分都是我們所謂的民主國家，但這次有很多機制，在這次疫病還有一些控制當中，你看到了什麼？民主有展現嗎？還是又回到了最原始的分配？最原始的封建、帝王？

**Brossat（羅惠珍翻譯）：**我們必須要講到民主國家。在講所有國家，特別是民主國家的時候，當我們面臨一個關鍵危機，我們必須能夠改變思考，不能再附著於基本人權，因為現在面臨人命關天的重大危機，必須要從民主自由轉到生死存亡，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新的思維行動。以傅柯的生命政治來講，我們這些被治理者，就像羊群一樣，是要裡面的羊生病、死掉，一個傳給一個，還是要把這些羊好好管好？這時候我們碰觸到的是生命政治的合理性。在這個關鍵時刻，這件事的重要性、存在、合理性已經遠遠超過所謂個人主義的自由這些基本人權的問題。剛剛提到，光是強迫戴口罩是不是已經違反基本人權，這個問題在法國向來是個爭議點，他們到現在才終於知道戴口罩對防疫的重要性，但還是有人說，戴口罩會讓我失去我的人性，因為人家看不到我的微笑。戴口罩是人類學上的不可能，有些大學教授、學院的人還是會用各種論述來反對戴口罩，但是我們必須要相信，當災難、危機來臨的時候，應該是以人命為前提，而不是自由明文標示來作為你抗爭的理由。當你說到戴口罩是違反自由的時候，像是法國去年黃背心運動的時候，那麼多警察去圍捕或粗暴對待，卻從來

沒有人說他是比戴口罩更違反自由民主人權，這是在法國的現象。重點是你面對一個關鍵期、重大危機，有些我們的思考行動要重新做。

**林深靖**：我稍微補充一下，有時候 **Alian** 他用語會比較誇大、好玩。剛剛提到法國有寫過 15 本書的專家學者在法國《世界報》這種有權威的報紙上發表文章，說這個口罩是多麼醜陋的東西，最嚴重的是，口罩遮擋我們的微笑，這是比什麼都還嚴重。另外他講到法國是民主體制的國家，但當黃衫軍運動發生，你很難想像法國的警察是多麼暴力。他說相對於法國的警察，香港的警察簡直是紅十字會，他是指面對這麼重大的生命危機的時候，作為政府或人民，要有些理智、智慧的行動，這難免會讓原來民主體制下的教條、信條是被擱置的狀態。當然，最重要的是，要讓老百姓能夠活下去，畢竟公民是活的、有生命的群體，所以最重要的是活下去，這種集體、團結、共同的，面對問題的概念應該被重新提醒。他強調有時候民主國家太注重個人、個體的自由，而忘了大家是一個共同生活的群體，這種群體的概念在面對這麼大的疫情的時候應該是重新被重視的。

**觀眾 C**：非常感謝教授，您引發了我們非常多對問題的思考，也給我們在台灣的人在思想上的挑戰。剛剛提到，在整個歐洲，1980 年代之後，就把整個二次戰後建立起來的「社會國」共識慢慢拆解的，但德國是例外。我想請問，德國為什麼在這波拆解「社會國」體制中是例外？跟兩德的統一有沒有什麼關聯或者是什麼影響？

另外有個問題是剛剛教授有提到的。舉一個小說《颶風》作為例子，最後又用法國諺語的火車直直向前，但我們不知道他會向什麼地方去，我覺得台灣可能也有這樣子的情況。當然，疫情整個好像是戰爭狀況，但台灣還可能會面對所謂台灣海峽戰爭的情況。大概有一個民意調查機構說，將近十五年來，台灣民意唯一沒有變的就是對於台灣海峽會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大概有 60% 以上的人認為是不可能的。但莫非定律又說，當你認為不可能的事情，他就會發生。就整個這次疫情，剛剛教授也提到比較悲觀的分析，以利潤為中心的世界資本體制並沒有因為這次手下留情的新冠病毒而收手，他們在疫情稍微減緩的此時就開始想要大舉地回收過去幾個月因為疫情而損失的利潤，作為可能是在剛剛講的小說裡面船艙的苦力，或者是最後講的法國諺語中，火車上面的乘客，像是我們在座各位，包括我在內，我們能做什麼？

**Brossat (林深靖翻譯)**：德國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他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就他自己所見的可能有兩個因素。一個是經濟的因素，德國經濟在整個歐盟系統裡面是最好的，由於他的經濟能力強，德國是所有歐洲國家裡充分做了檢測的。另外，是德國整個醫療系統與經濟能力，本身醫療系統並沒有像其他國家

被破壞。此外，可能也與德國過去的歷史經驗有關，德國經歷過納粹這麼重大的危機，像梅克爾或者這些政治領導人，心裡面隨時就有這個重大危機的理解跟歷史上的記憶，面對一個重大危機來的時候還是能夠有因應的概念，甚至就會把人民健康的危機，當作是過去面對納粹的危機來理解。就像在台灣，台灣在這次整個防疫過程相當突出，是不是因為過去台灣有過極權體制？也許不能那樣相互比擬，但過去的歷史記憶或許會對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會有所影響。

**林深靖：**面對剛剛所提到的問題，關於兩岸戰爭危機的問題，因為蘇醫師提到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台灣人都不相信會有戰爭，他是認為相反，如果有百分之四十懷疑會有戰爭的可能性，那已經是非常了不得。因為問歐洲人，中國跟美國之間會不會開戰、會有衝突，絕大部分的歐洲人是不會相信的。因為戰爭有時候就像疫情一樣，有人就偏偏不相信，但是他提到一個觀點，就是我們相對於這種主權、戰爭的問題，常常會說 **yes or no**，好像必須要有一個回覆、回應。但如果放到比較長遠的歷史來看，他舉的兩個案例蠻有趣。比如像洛林阿爾薩斯，究竟是德國還是法國的，在歷史上爭議很大，這曾經引發三場戰爭，其中兩次是世界大戰，死亡人數超過百萬。你現在如果去阿爾薩斯的史特拉斯堡，不會想這個問題，在阿爾薩斯遇到的人到底是講德文還是法文，到底是德國人還是法國人已經無所謂了。那個邊界跟戰爭過去可怕的，在長久的歷史來看完全是消融，不存在的，你不需要去回答到底是德國人或者法國人。事實上當你在穿越德法邊界的時候，因為阿爾薩斯跟洛林當然就在邊界這邊，這已經沒有必要性去回答。還有像是尼斯，過去是義大利的，那到底是法國還義大利的？很多義大利人住在尼斯，他們可能一週會來回好幾趟。從長遠歷史來看，到底屬於誰的？雖然爆發很大的衝突，但長遠來看，這個問題就飄走、融化溶解了。所以台灣跟中國的問題放長遠來看，未來是不必要去回答是屬於誰的，或者根本不會有戰爭的問題，也可能不是一個問題。就像阿爾薩斯跟洛林，就消融在整個生活當中。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主權問題通常是很愚蠢的問題，人民的生活才是關鍵、更有靈活性，人民是比主權問題更加聰明，比一個國家更加聰明。他的靈活度，知道如何處理未來的生活，知道如何讓生活可以好好繼續下去。像 **Brossat** 所經驗，他的父母親就住在法國跟義大利的邊界，來來去去，在整個生活裡面，應該要聽人民、不該聽國家的。

**翁文嫻：**大家都欲罷不能，很想繼續請教這位 **Alain Brossat** 問題。他作為一個歐洲哲學家，今天到成大給我們一種反省的態度表達，對自己整個歐美的民主的狀況，做了一個很深刻的反省呈現，這種反思能力很重要。剛剛他提到的，廣大的人民總是比政權、主權更具有智慧、靈活及對問題的應對能力。很謝謝教授。最後我就引用我們去年來到成大演講的朱利安先生，他也是法國人，是

漢學家，他最近也發表了一個說法，我們生活時常是在進步當中，常常是在進步中的一種生活，我們是有進步的危險，生活本來就是被各種樣子束縛，但當我們思考危機的時候，危才有機，在希臘裡面可能是個切面，現在開始就是危機，但中文的語意是危才有機，我們要生於憂患，危才有機。今天一個歐洲哲學家來到成大，為了這個問題給我們很多很好的啟示，台灣也因為這個疫情，世界才都對台灣有個深刻的印象，確實是危才有機。

臺灣學  
N C K U